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周桂钿 主编

中国
传
统
政
治
哲
学

ZHONGGUO CHUANTONG ZHENGZHI ZHUXUE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国家“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主编 周桂钿

撰写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祥俊 周桂钿 施建中

贾新奇 隋淑芬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哲学是什么	(1)
二 中国有没有哲学	(2)
三 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	(5)
四 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	(11)
五 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	(15)
六 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	(21)
第二章 天命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	(25)
第一节 原始天命论与三代政治	(25)
第二节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汉代政治	(34)
第三节 韩柳刘对于天命论的讨论	(44)
第四节 天理良心与宋明时代	(50)
第五节 天坛及祭天活动	(56)
第三章 经学——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	(71)
第一节 经书、经学与政治	(72)
第二节 汉学系经学的政治哲学	(90)
第三节 宋学系经学的政治哲学	(118)
第四节 清学系经学的政治哲学	(135)
第四章 大一统论——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	(152)
第一节 大一统论的由来与发展	(152)

第二节	天子是大一统政治的核心	(163)
第三节	百官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件	(215)
第五章	纲常论——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	(234)
第一节	纲常论的历史演进	(236)
第二节	纲常论的政治意义、政治理想	(256)
第三节	传统政治中的纲常论影响	(272)
第六章	民本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	(295)
第一节	民为国本	(297)
第二节	治国为民	(308)
第三节	追求民权，反对专制	(334)
第七章	德治论——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	(370)
第一节	德治主义的涵义及产生与发展	(370)
第二节	德治论的几个特点	(378)
第三节	德治论的根源	(393)
第四节	对德治论的反驳	(412)
第八章	常变论——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	(429)
第一节	孔孟的改革思想	(430)
第二节	战国时期法家的改革及其改革理论	(437)
第三节	《周易》的变革理论	(449)
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改革与董仲舒的对策更化	(452)
第五节	北魏孝文帝改革及改革思想	(465)
第六节	王安石变法及其变法理论	(470)
第七节	张居正改革	(488)
第八节	清前期的改革	(513)
后记		(526)
人名、书名、重要概念索引		(527)

第一章 緒 论

一 哲学是什么

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哲学理念，都可以给哲学下个定义。胡适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19 年出版)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它的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三版)理论思维是与科学精神相联系的理性思维，精神境界是与人文精神相联系的非理性思维。世界上许多哲学家下过许多关于哲学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虽然各有特色，其基本精神却是相通的，只是角度不同，不能说这个定义是对的，那个定义是错的。同样，世界各国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哲学，也不能说这个哲学是哲学，别的哲学不是哲学，只能说各种哲学有自己的特色而已。正如胡适所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同上)中国自然有自己特色的哲学。西洋所谓哲学的内容“与中国魏

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也就是说，中国的玄学、道学、义理之学，就是中国的哲学。哲学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宇宙论、人生论、方法论。宇宙论又称形而上学。人生论即价值论，包括伦理学与美学。方法论又称知识论，包括科学理论与逻辑学。宇宙论与方法论都是追求真的，伦理学是求善的，美学是求美的。因此，哲学应该包括追求真善美的最基本内容。

二 中国有没有哲学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例如美国汉学家莱特（A. F. Wright）曾说：“中国没有哲学。所谓‘中国哲学’，只是一种思想（或思潮），介于古俗因袭惯例与严谨逻辑分析之间。”当然这也不是个别人的见解，而是西方人对中国学术的普遍看法。刚从欧洲哲学那里学点知识的人也常常说“中国没有哲学”。例如，贾丰臻《中国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代序中说：“我敢大胆地说中国以前只有理学，没有什么叫做哲学。”“我又敢大胆地说中国以前只有理学，没有什么叫做科学。”于是他们只能写《中国理学史》之类的著作。至今也还有人对中国有没有哲学持怀疑态度，或者虽然承认中国有哲学，却认为中国只有一些哲学思想，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或者认为中国哲学水平不高，无法与西方哲学相媲美；或者认为，中国哲学只是勉强称为哲学，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能算纯粹的哲学。或者说，中国基本上没有哲学，只有极少数人算得上哲学家，例如中国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只有王国维一个人算得上哲学家。其他人都只是政治思想家、革命家或其他什么家，就是不够哲学家这种规格。

第一章 絮 论

到底中国有没有哲学？也许以前的人们出于民族的心理，或者出于爱国心，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论证中国确实有哲学。至于动机如何，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们的论证是否能成立。胡适是这样论证的：哲学没有一定的定义，于是他也可以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生切要问题的学问。中国古代当然也讨论过人生切要的问题，自然也就有了哲学。例如中国古人讨论过善恶问题，这就是人生的切要问题。因此，中国确实有哲学。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胡适还据此提出多种不同的哲学形态：研究天地如何产生的宇宙论哲学，研究知识的范围、产生、作用和方法的知识论哲学，研究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动的伦理学，研究如何使人有知识，能思想和行善去恶的教育哲学，研究社会、国家如何管理、如何组织的政治哲学，研究人生归宿问题的宗教哲学等。冯友兰也是较早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他学习了西方哲学以后，根据西方哲学的内容，从中国古代学术著作中寻找与之相类似的内容，“选出而叙述之”，就成了中国的哲学。他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先秦为诸子阶段，汉以后为经学阶段。诸子阶段分儒、墨、道、法、名各家，各家选出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来叙述。他把《淮南鸿烈》作为诸子中的一家来叙述。经学阶段又分几个小阶段：两汉、南北朝、隋唐、宋明、清代这样几个阶段。每一阶段选出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加以叙述。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用“文化要素”的方法论证中国哲学确实存在。他针对一些人的“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种观念，提出构成文化的一个基本成分是哲学，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哲学。说中国没有西方形态的哲学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了。”他还认为，根据西方哲学的标准，说中国没

有哲学，是“霸道和无知”，“那是自己太狭陋”。

前贤的这些论述，都是有合理性的。我想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再作一些阐发。胡适认为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并有不同的门类，有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我想如果把人生切要的问题看作是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类，哲学就是对真、善、美的最高层次的理论探讨。或者说，哲学是关于真、善、美的最根本的、最基础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把哲学分为三大类：求真的哲学(包括现在的宇宙论、科学哲学、逻辑学、知识论等)、求善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等)、求美的哲学(艺术哲学或美的哲学)。欧洲哲学以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求真的哲学为主，而中国哲学则以政治哲学、伦理学等求善的哲学为主。欧洲也有重视伦理的哲学家，如17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就写过《伦理学》、《神学政治学论》等著作，论述了关于善的问题。中国也有注重求真的哲学家，如一世纪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写过一部巨著《论衡》，详尽地讨论了虚与实的问题，他自称写作的宗旨是“疾虚妄”，“求实诚”。而中国历史上主流派还是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这些求善的政治哲学家。胡适虽然早已提到“政治哲学”，但在长期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却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政治哲学。据此，我们认为不是中国没有哲学，而是中国的哲学与欧洲的哲学有形态上的差异，欧洲的哲学是以求真哲学为主，求真哲学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中国的哲学却是以救世济民的求善哲学即政治哲学为主。用欧洲哲学否定中国哲学与用中国哲学否定欧洲哲学都是不可取的，片面的。如果用一种哲学作为标准，否定与这种哲学不同的其他形态的哲学，那么，就会否定丰富多元的哲学，其偏见显而易见。例如用思辨哲学中的一种类型为标准，

认为世界上只有叔本华等几位是哲学家，其他都不是；中国在 20 世纪中只有一位王国维算得上哲学家，其他人都不是，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都不是哲学家。根据这个标准，西方的卢梭、杜威甚至连黑格尔也都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都有身外的追求。都有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倾向。这种哲学和哲学家的标准是否也太严格了？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其狭隘性是很突出的。即使用这个非常狭隘的哲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庄子也够哲学家的资格，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家呢？历史上的一些人物能够在真、善、美诸方面的根本问题上提出重要的新见解，他的思想体系就会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一时大儒，自成一家，他就是哲学家，他及其思想就在历史上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有些人当了很大的官，一时很显赫，虽然也讲了很多话，发表了很多演说，出版了豪华精装的大厚本书，著作等身，过后却没有得到相当的地位，原因何在？冯友兰先生认为，多数情况是他们的思想“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二》）。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名标青史的思想家都必定有“真”的东西，有真真、真善、真美的思想成果。总之，中国还是有哲学的，只是哲学形态与西方的哲学形态有所不同而已。

三 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之际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指的是空间，中国古代称为“宇”，佛教称为“界”。古今之变是指古今历史，指的是时间，中国古代称为“宙”，佛教称为“世”。司马迁研究“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这就是哲学，就是宇宙观或世界观。

中国古代哲学家研究“天人”与“古今”时，着重点在“人”与“今”上。研究“天”，着重于“天”对人的关系，对人的意义。研究“古今”，是以研究“今”为主，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研究“成败兴坏之理”，为“今”提供借鉴，所谓“古为今用”。

研究“人”是极端复杂的。每位哲学家所研究的方面又是很复杂的。我们从每位哲学家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所追求的理想、理论的主要倾向，作大体分类，分为求真、求善、求美三类。求真者也求善、美；求美者也求真、善；求善者也求真、美。如果不了解这种复杂情况，把大体分类绝对化，那么，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疑问和困惑。

中国古代求真的哲学家以王充为典型代表。他对于所接触的有关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问题，都进行全面审查，重新讨论其真假、虚实。他写了“九虚”、“三增”，对权威的经书所载，圣人之言，对于民间众人一辞的传统说法，都作了分析、批判。他自己把《论衡》一书的宗旨概括为“疾虚妄”。疾是反对，虚即虚假，不符合实际。妄指不合理，谬妄。疾虚妄的目的在于“归实诚”，使人们都相信真实的、合理的说法。虚实之辨，也就是伪真之辨。反对虚伪，追求真实。我们称王充哲学是求真哲学。

求真哲学跟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相联系。王充这位求真的哲学家吸取天文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宇宙本原问题，认为物质性的、无意识的天地是宇宙的终极本原。人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天地是包含气的实体。天地之气中成分复杂，其中有一种精微的气叫“精气”，是人的意识的物质基础。精气在人体中，人就有了意识；精气离开人体，人就没了意识。精气就是自然的气，没有意识，没有了精气的人体（尸体）也就没有意识。据此，他认为天只是含有气的旋转着的最庞大的自然物，并没有意识，因此不可能与人发生相互的精神感应。王充从求真的

角度，否定了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精神是精气与人体结合的产物，一旦分离，无精气的人体与无人体的精气都没有精神作用。从而否定了人死后精神会变鬼的可能性，阐述了形神一元论的观点。

求真的哲学家王充坚持唯物论观点，讨论当时各种理论问题。讨论历史观时，批评儒家“说圣泰隆”、“称治泰盛”的偏颇，认为“实商优劣，周不如汉”。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周代都不如汉代。儒家经常颂扬三代文明，三代中又是周代最文明，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的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二代的制度而建立的，多么丰富的文化呀！我拥护周代的制度。周代还不如汉代。因此，王充推论出应该歌颂汉代社会的结论。周汉比较，王充坚持了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体现了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王充在讨论认识论时，否定先验论，又强调“以实验之”、“以道论之”，充分利用事实，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驳斥当时盛行的各种迷信。他强调知识的作用，认为它比体力有更大的力量，先于培根一千多年提出了“知为力”的观点。王充在认识论方面的系统观点，体现了近代科学精神，因此，他被称为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者。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充是求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突出代表。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研究更注重善恶之分、义利之辨。从人性到教育，从事亲到忠君，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都贯穿着善恶、义利的问题。善道、王道、德政、仁政，都是对善的追求。善，就是指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受益的人越多，善也越大。相反，恶是指有害于人类的事情。受害的人越多、受害越深，恶也越大。做一件事，有益于少数人，损害了多数人，一般

说，这就是坏事、恶行。相反就是好事、善行。社会现实是非常复杂的，远不像抽象概括出来的理论那么简单。

从现代学科划分来看，求善的哲学应该包括伦理、宗教、政治、教育等学科领域。在这些领域虽然也有真伪虚实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善恶的问题。伦理道德是以善恶为主要范畴。在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地狱，都不是科学的真伪问题。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劝善惩恶，用天堂吸引人们行善，用地狱来抑制人们作恶。一般说来，宗教哲学都是求善的，并不是求真的，主要范畴是善恶，而不是真伪，或者唯物、唯心。政治是管理人的复杂工程，有明君、昏君，有忠臣、奸臣，有仁政、暴政，有王道、霸道，有清官、贪官，有治世、乱世等等。其中贯穿一条线，对人民生活带来的是更多的好处，还是坏处。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幸福，那就是善的；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灾难，那就是恶的。因此，在政治哲学中，主要也是善恶问题。它不探讨宇宙本原问题，不存在唯物、唯心的差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哲学家提到宇宙本原问题，也就有唯物、唯心的问题。一般政治哲学家对宇宙本原不关心，也很少研究，没有专门的论述，只是偶尔提到，不值得大作文章。相对于政治哲学来说，那也是次要的。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教育，几乎所有大哲学家都是教育家。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孟子、庄子、墨子、荀子也都是著名的教育家。董仲舒的弟子不计其数，由于人太多，很多弟子只能从师兄那里听取老师的教诲，甚至受业几年，还没见过老师一面。弟子当了大小官员的有数百人。他的子孙也凭学问当了大官。朱熹也是大教育家，他与弟子形成了一个大学派，叫闽学。中国的古代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当然也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这些宗教哲学都是追求善的。例如佛教讲要忍耐人间的各种苦难，不能贪图任何物质享受，提倡布施，救苦救难，对人应以慈悲为怀。自己

少索取，讲奉献，并向他人宣传。

孔子讲仁，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提倡德政，礼治，不主张杀人，重义轻利，主张学习文化，提高修养，起到榜样的作用，来影响人民。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身正，是从政的重要条件。如果自身不正，那怎么能纠正别人呢？怎么能靠命令去指挥、领导别人呢？孔子所说的修身，是为了从政。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论是从属于政治哲学，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是求善的思想家，是政治哲学家。孟子讲人性有善端、倡导仁政，也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家。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要统治者爱护人民，保护人民。要统治者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来争取民心。如果人民能从心里拥护统治者，统治者就可以享受太平生活，而且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统治者损害人民的利益，那么，人民就会起来推翻他的统治，这也是天命。孟子把天命和民心统一起来，就要从精神上强迫统治者关心并保护人民，多做利民的事，少做或不做害民的事。孟子还提出应该做的最基本的好事，如保证人民有一定的土地（恒产），生产的粮食足以养家糊口。富以后还要进行伦理和文化的教育，使人民文化素质得到提高，要推行利民的制度，还需要任命一批贤能之士去实施，尊贤使能，使俊杰人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那些误国害民的庸人、小人、奸人，都应该从各级政权机构中撤出，贬斥或处罚。要做这些事情，困难不困难呢？孟子认为不难，只要尽心就行了，就像摘两片树叶送给老人，这有什么难呢？要是让人挟起泰山飞越渤海，那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十分困难的。孟子从人性善到仁政学说的一套理论，就是他的求善的政治哲学。孟子有时还强调独立人格，大丈夫精神，威武不能屈。但后来的荀子则十分系统地论述政治哲学体系，隆礼重

法，君道臣道，民富国强，劝学儒效等等。孔、孟、荀对儒学的贡献是不同的，孔子是创立者，孟子有所发展，并在辟杨、墨中起了卫道的作用，荀子则是经过百家争鸣之后，重新反思，冷静思考，把儒学的政治哲学系统化了，形成比较完善的、可实施的思想体系。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似乎都没有脱离荀子所完善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谭嗣同认为中国几千年只有荀学，不是没有道理的。荀学缺乏神性，只有现实人性。对于古代，缺乏神性，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秦代的社会问题应该说与此有关。汉代董仲舒推衍天人感应说，填补了荀学的一处空白，一点缺陷。

中国古代也有求美的哲学，即艺术哲学。庄子是艺术哲学的重要代表，以前很少有人注意他的哲学特性，总是以求真哲学的标准来衡量他，把他判为唯心论和相对论，作为反面人物放在哲学史上。许多高水平的学者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徐复观先生经过一番研究、探索，突破现代人的误解，“发现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他认为“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是表现在绘画与文学两方面。而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魏晋时代的玄学家，历代隐遁山林游心清泉的学者多是庄学的信仰者，淡泊宁静，清谈玄远，追求美的精神境界，崇拜高雅，贬斥俗气。

从先秦诸子来看，求善的政治哲学家占多数，其中包括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的《老子》具有“南面之术”，统治术、权术，自然属于政治范畴。阴阳家研究天文历法则是求真的科学哲学范畴，而占星术以及其他方术，多属宗教性质，有求善的倾向。纵横家都是政界人物，他们的学说也是求善的内容。

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求善的政治哲学成为正统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也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深刻地影

响到全民族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而求真的科学哲学在科学研究领域如医学、天文学、农学等都起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思想界则不被重视，甚至被作为“异端”而加以贬斥。求美的艺术哲学虽在绘画、书法、文学等文艺界有深刻影响，但在整个思想界的影响远不及政治哲学。而在政治哲学中以儒家的学说为主线，辅以法家和道家的观点。这里的道家主要是黄老道家，而不是庄子的道家。这是我们的见解。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这当然还有讨论的必要。

四 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

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本来就是历史事实，原不必讨论。既然有人提出异议，自然还需要论证一下。

儒学创始人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春秋时代的显学，可见影响之大。汉代独尊儒术，把儒家使用的几本教科书奉为经典，政府以明经取仕，天下士人都通过读经进入仕途，当官受禄。讲经、解经、注经成为一时风气，形成一门新的学问：经学。经学的出现，充分证明了儒学的社会地位，是在政治思想上居统治地位。不承认儒学在汉代居于统治地位的人讲不出什么道理，更举不出什么事实，他们解释不了当时盛行的经学现象。至于谶纬，则是经学现象的副产品，只能增加经学盛行的旁证，是经学权威过头的表现，而不能以此否定经学的权威性。

魏晋、隋唐时代，三教并行，似乎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但是，我们读一读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就会发现，尽管佛、道也很受统治者的重视，有的和尚被聘为国师，入宫讲佛经，有的皇帝如梁武帝就是佛的信徒，曾三次舍身佛寺。但是，当时朝廷仍然

是按儒学规范运作的，政治机构还是按儒学设置的。梁武帝讲佛经时，也没有忘记讲《孝经》，还著有《周易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隋唐时，各级行政官员主要的都是熟读经书的儒生。和尚和道士当官则是极个别的。佛教重要人物被皇帝聘为国师，在隋唐时代比较流行，例如，“隋炀帝之尊智者大师，唐太宗、高宗之敬玄奘三藏，武后之于神秀，明皇之于金刚智，肃宗之于神会，代宗之于不空，佛教最有名之宗派均因之而兴起。”（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8月）政权与宗教互相利用，宗教可以帮助政权麻痹人民，这种作用是不明显的，潜移默化的。而政权对宗教的作用则十分显著，哪个佛教宗派的代表被朝廷请入皇宫当国师，讲佛经，那一宗派就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势力庞大的著名宗派。玄奘三藏被唐太宗垂青，唯识宗曾经盛极一时，成为中国历史上佛教最鼎盛时期。即使在这一时期，佛教也没有像西方天主教那样凌驾于政权之上。历代各政府的政治活动都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宋代道学家是以孔孟之道为主的，正如韩愈所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传下来的仁义之道。南宋朱熹继承北宋程颐等人的思想，形成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的思想是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的指导思想，他的《四书集注》是几代科举考试、选录文官的主要必读书，具有经典的权威性，与“五经”并列。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主干，毫无疑问。近年一些人提出在哲学上，道家是主干，儒家哲学似乎微不足道。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

首先是如何分“家”的问题。先秦著作中以《庄子·天下篇》为最早学术分派的论述，其中有“方术”、“道术”的差别。方术指一般学问，相当于现在的学术，道术指系统理论，相当于现在的

哲学。该篇介绍“道术”时，首列儒家，说它“以天为宗”、“以仁为恩”、“以法为分”、“泽及百姓”，又说它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其次是墨家，著《非乐》、《节用》，推崇大禹“形劳天下”、“以自苦为极”的献身精神。接着介绍宋钘、尹文学派和彭蒙、田骈、慎到学派，然后才论及关尹、老聃闻风而悦之的道家学派。最后是庄周、惠施的学派。这是战国时代的学术派别，也是哲学派别。这时庄周与老子并列，不属一派。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分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司马谈所说“道德”、“道家”，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那一定不是老子的道家，因为老子大概只知道孔子，不一定知道孔子与其弟子们创立的儒家，更不知道背叛儒家的墨翟所创立的墨家，自然谈不上“采儒墨之善”了。这个道家大概是战国后期到秦汉时代流行的黄老道家。战国后期，经过几百年百家争鸣之后，融合成为思想新趋势。《管子》、《黄帝书》都在做融合思想的工作。《吕氏春秋》与《淮南鸿烈》更是融合思想的代表性的鸿篇巨制。因此，先秦各家思想都可以从两部书中找到影子。这种融合巨著无法归入先秦某一家，只好另列杂家一类。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的（《汉书·艺文志》）。杂家这一融合特点跟司马谈说的道家颇相似。但是，班固既然把《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归入杂家，说明它们就是杂家，而不是道家。现代人根据自己给道家作的界定，再按自己设定的标准，把很多原不属于道家的人物和著作，归入道家，然后再推出道家是中国哲学的主干。人物如荀子、陆贾、董仲舒都是历来公认的大儒、名儒，有人却说他们是道家：黄老道家或新道家。“经”是儒家的教科书，其中包括《周易》经传。现在有人提出《周易·系辞传》是黄老道家的著作，理由是《系辞传》中有一次讲到“精气”，他认为“精气”一词是道家的专用词，所以《系辞传》就是道家著作。如此牵强附会，立论岂能坚